

民國斯文

肖伊緋——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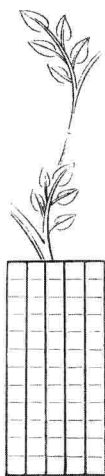


MINGUO
SIWEN



肖伊绯——著

民國斯文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斯文 / 肖伊绯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95-5189-7

I. ①民… II. ①肖…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665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20 mm × 970 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80 千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15	104	095	086	079	070	062	058	053	050	044	031	023	009	001
章士钊说「铁饭碗」	傅增湘的侧室	傅增湘与《永乐大典》	周作人之死与八十自寿诗	周作人的七幅自寿诗手迹	周作人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周作人的苏州之旅	胡适二题秦戈尔像	胡适的「师爷」研究之余	胡适的一首打油诗	胡适的《四十自述》「华侨版」	胡适的糖尿病、心脏病及其他	「代课老师」胡适之	温州塾师对决梁启超	王国维与王葆心之死

目录

241	227	220	211	200	194	188	180	169	159	152	144	135	125
《体用论》与熊十力之死	《淮南子》与刘文典之死	孙人和的校书薪水	吴毓江与胡适	朱谦之的「龙门客栈」	张爱玲记错了	郑振铎借书不还？	日本学者的「扬州梦」	刘文典落选「中研院」始末	刘文典的「庄子谈荆」	苏渊雷与爱因斯坦	顾颉刚的致歉启事	程先甲与西北军政	冒广生的「晚明情结」

王国维与王葆心之死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内鱼藻轩前的昆明湖，一代国学大师自杀了。对其死因，历来各种揣测与传说不断，有“遗老殉清说”、“殉文化信念说”、“性格悲剧说”、“罗振玉逼迫说”等等，一时间莫衷一是。还有一种说法，后来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而且被普遍认为对王国维死因的剖析较为客观完善，那就是梁启超提出的“枪毙学者刺激说”。

1927年6月14日，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羞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即是所谓“枪毙学者刺激说”的出处。

梁启超所言“枪毙学者”之事，历史上确有。1927年4月11日，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湖南人民第一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上，公审了曾被章太炎称为“读书种子”的叶德辉，此事轰动湖湘，震惊海内。当时，特别法庭宣布叶德辉犯有五条大罪，即：(一)前清时即仇视革新派，戊戌政变，残杀革命人物，为内幕主张之人；(二)充筹安会会长，称臣袁



王国维(1877—1927)



王葆心(1868—1944)

氏,促成袁氏称帝;(三)促成吴佩孚武力统一,并主张赵恒惕受北京任命;(四)万恶军阀迭予要职,利用其封建思想,发表封建之文字,为反动之宣传;(五)为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这五条大罪一判,他便非死不可,当天下午,叶德辉就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叶德辉被枪毙之后的第52天,即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揣着一张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纸条在颐和园沉湖自杀。这两位知名学者的非正常死亡,看起来真如梁启超所言,的确有某种时空上的感应与关联。那么,王葆心之死呢?是否真那么凑巧,是在1927年上半年被枪毙的呢?

据考,近代的确有一位学者叫王葆心,字季芴,号晦堂,又号青垞老人,湖北罗田人。王氏生于1868年,是著名的方志学专家。王氏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博洽之名闻于省内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应诏入京,在学部、礼部任职,并兼任京师大学堂、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教习。1912年返鄂任革命实录馆总纂,翌年赴长沙任湖南官书报局总纂。1917年再次入京,任教育部编审、京师图书馆总纂兼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返鄂任武昌高等师范教授,时值湖北国学馆成立,又应聘任馆长。梁启超所言“两湖学者”,王氏与叶德辉倒也都符合这一身份。但王氏并没有死于1927年,也不是被枪毙的,而是病逝于1944年,享年77岁。

据考,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王葆心应聘为教授。1934年,任湖北省通志馆总纂。抗战爆发后,举家返迁罗田故里,直至1944年病逝。王氏一生著述宏富,据统计有一百几十种,涉及经学、史学、文学、方志学、西学等领域。王氏逝世后,其早年知交董必武曾撰挽联云:“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善始善终的地方学者,与梁启超信中所言之“王葆心”,似乎并无关联。

无独有偶，王国维的弟子徐中舒在其所撰《王静安先生传》中，提到了一位被枪毙的“武昌王葆生”，似乎坐实了这桩“命案”。他写道：“先是长沙叶德辉，武昌王葆生，均以宿学为暴徒枪杀于湘鄂。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革命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党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先生……又深鉴于叶、王等之被执受辱，遂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愤而自沉云。”（《王静安先生传》，《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三号，1927年7月。）文中提到的“王葆生”与“王葆心”仅一字之差，难道另有其人？通过查证20世纪20年代的两湖学界，并没有一位能与“王葆心”同称作“宿学”的“王葆生”存在。更大的可能是杂志印制中误排，将“心”字误作了“生”字。此文中的“王葆生”乃“王葆心”误排而成，实际上仍然是指梁启超信中所提到的那个王葆心。但问题是，时任湖北国学馆馆长的王葆心，怎么就传言被活生生的被枪毙了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国维自杀之后，“枪毙学者刺激说”中所说的叶、王二人，还曾出现在同时代一些与王国维无甚交往，也并不以此说来附会王国维之死的学者笔下。这就让王葆心被枪毙的说法看似更为逼真，让人怀疑同时代湖北学界是否真有同名的第二个“王葆心”了。当时，任教于沈阳文学专校的辽宁人金毓黻，就在日记中明确记载了叶、王二人被枪毙的事件。在1927年5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长沙共产党处老儒叶德辉以极刑。叶公居乡好干预公事，颇乏令望，故为党人所衔。”5月3日，金毓黻又录入了湖南特别法庭枪决叶德辉罪状布告，并记道：“同日枪决者尚有俞诰庆、徐国梁二人。叶为前清进士，俞为举人，年皆在六十以外。徐身世未详。”6月8日又记道：“自南中倡公产学说，整军北上，席卷江汉，声势汹涌，而湖南北之学者，多见刃于党人，如长沙叶氏、武昌王氏（忘其名）其尤著者也。”（详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3册，辽沈书社，1993年。）金氏也在日记中将“忘其名”的武昌王氏与叶德辉相提并论；显然，此人一定是王葆心了。那么，为什么在同时代学人口中、笔下，会以讹传讹，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王葆心“枪毙”了呢？

笔者以为，这样的以讹传讹一定事出有因。或许，王葆心之死，另有隐情，只不过尚不为后人所知罢了。但新近发现的一份《罗田王青垞先生讣告》，却实实在在地破解了这一“枪毙”之谜。讣告中明确提及王葆心生平及其生卒年、死因、享年等诸多历史细节，不容后人再作唐突揣测了。因史料难得，故全文照录，酌加句读如下：

讣

奠设罗田县古塘老屋

不孝承重孙学引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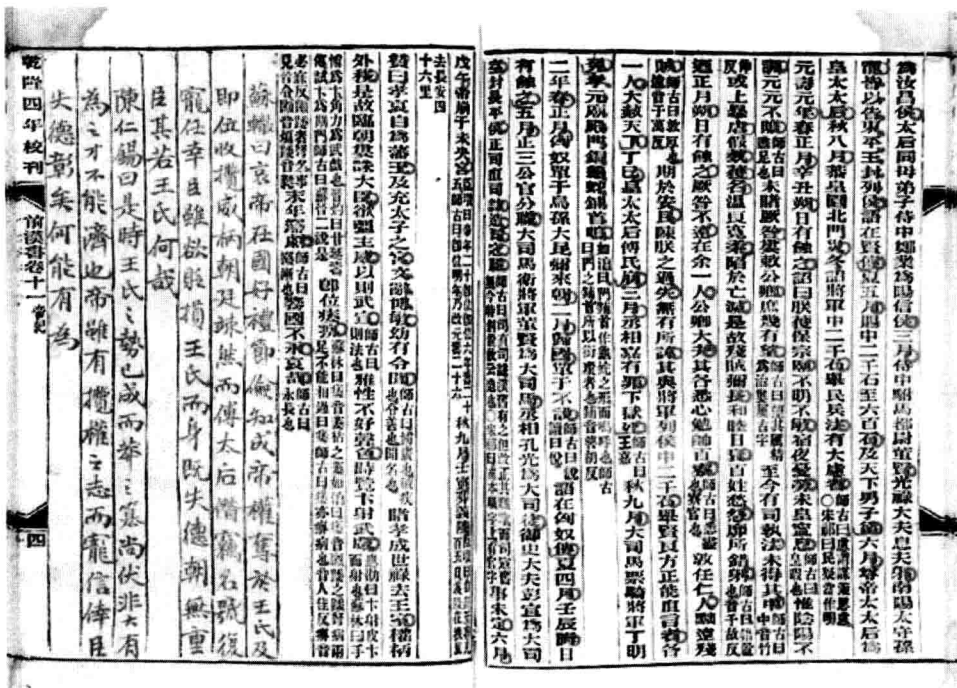
显祖考清授中宪大夫、学部主事、奏调总务司行走兼图书局编纂、礼部奏聘礼学馆纂修、学部奏留七品小京官、拣选知县、国子监奉爵官，历充郢中博通书院院长、潜江传经书院院长、黄梅调梅书院院长、本县义川书院院长、汉阳府晴川书院教习、汉阳府中学堂前援堂教习、民办普通中学堂教习、汉黄德道师范学堂教习、两湖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教习、公举湖北江汉学堂评议员、本县师范传习所兼高等小学堂堂长、乡立高等小学堂堂长、乡立两等小学堂堂长。民国选任湖北革命军实录馆总纂、北京教育部图书馆总纂、湖南官书报局总纂、武昌高等师范教授、国立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立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通志馆总纂、罗田县志馆馆长。清光绪癸卯科经魁、甲午科优贡、罗田县学增生王公，讳葆心，字季芴，行四。大人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即夏正三月二十一日亥时寿终正寝。距生于前清同治七年戊辰十二月初七日申时，享寿七十七岁。不孝学引等侍疾在侧，亲视含殓。不孝女瑛，服务湖北省银行鄂东支行，闻电匍匐奔丧，遵礼成服。迺以时局未安，先行卜葬于本县大河岸西之新阡。兹谨择于国历四月二十五日在本宅堂奠。叨在

谊谅，蒙矜恤哀，此赴

闻

从这则讣告来看，王葆心的死因、死于何时何地，皆一目了然，毋庸多言。文中对王氏历年所任职务叙述甚详，我们也应注意到，王氏虽为湖北地方学者，且任教乡邦有年，但还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在京任职。前清时在京所任职务姑且不论，仅民国时曾任北京教育部图书馆总纂一职，在京城文教界中亦应有一些声誉。至于其晚年归乡任教之后，京城文教界对王氏的印象逐渐淡漠，也在情理之中。但在京城文化圈子里，皆认为远在湖南的叶德辉与湖北的王葆心，的确是能代表同时代两湖学者的；对此二人学术水准认可并略有印象，却并不十分熟悉的情况是可能的。

可以看到，王氏除了 in 古文、方志学上卓有成就之外，由于兼任多种教职，



王葆心旧藏，朱批《前汉书》

弟子辈也广布南北，在学术界、文化圈的影响力肯定是有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就是其弟子之一。原来，徐复观于1924年报考湖北国学馆时，受到王葆心与黄侃的器重，被录取为第一。受教于王氏并得到他的资助，徐对此终生铭感，临死前还询问王葆心著作的出版情况（《王葆心传》，崇文书局，2009年）。此外，王氏对藏书及版本学也颇有心得，这一点又与叶德辉颇为相似。只不过叶氏专注于此，声名早播；而王氏并不以此为志趣，不为人知罢了。王饗（1888—1968）所著《续补藏书纪事诗》中，专列有“王葆心”一条（第四十三条），据他考证，现存经罗振常印行的，署为杨守敬（1839—1915）所撰的《藏书绝句》，实为王葆心所作。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四三、王葆心（季芎）

藏书绝句征鸿博，李代桃僵作望堂。
不有之江守藏史，朱张夷逸孰评量。

王季芑教授(葆心),曾撰《藏书绝句》,辨别版刻源流,与我乡叶鞠裳(昌炽)《藏书纪事诗》之征溯藏弃源流者,可称两绝。艺术家有论诗、论词、论曲诸绝句,美术家有论书、论画、论印、论琴诸绝句,目录版本家不可无此两作也。上虞罗子经(振常)印此作于上海蟬隐庐书林,误作者为惺吾(守敬),若无人揭季芑名氏于《文澜学报·文献专号》,则郑笈《诗》而郭注《庄》究为何人,无人知之,而季芑之名遂永不见于经传矣。

众所周知,杨守敬为清末民初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且精于金石、书法、史地学等,曾东渡日本访求宋元珍本,并将所得珍本精心影刻传世,一时传为书林盛举、学林佳话。之所以将王葆心诗作张冠李戴于杨守敬,且为海上印书名家罗振常所青睐并印行,一方面说明王葆心在版本学方面的造诣颇高,绝不亚于名家杨守敬;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葆心本人知名度不高,至少在藏书界名不见经传。虽然王謇对其评价很高,并钩沉出了这样一段阴差阳错的故事,但即便是其援引的《文澜学报·文献专号》,其出版周期亦在1935—1937年之间,已经是在梁启超等风传的“被枪毙”传闻十年之后了。应当说,这样的钩沉与澄清,已不具备时效性与公共性,只能沉埋于藏书家小圈子里偶作谈资罢了。当然,现在来看这样一则文献信息,对我们正确认识王葆心这个人物不无裨益,至少再次确证了此人并未死于1927年。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来看,王葆心死于“枪毙”实属误传。而之所以误传,并以此误传关联于叶德辉之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时局动荡,两湖地区革命的迅猛之势是京城学术界、文化圈中人都始料未及的,他们对所谓“红色恐怖”的惊慌失措乃至有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之递进式传谣——这是当时宏观层面上的舆论导向。在此导向之下,人们会揣想,枪毙一个叶德辉已是举国震惊的铁证(且与叶氏同时被枪毙的确实还有一位老年学者),另一个久不闻讯息的王葆心或也难逃此劫,于是,就把一个湖南、一个湖北的叶、王二人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套快讯式的传闻。当然,也不会真有好事者去逐一查证,有一个叶德辉的铁证,圈子中人大都就宁可信其有了。不久,王国维自杀,又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铁证;于是叶、王二人皆被枪毙,刺激王氏自杀的说法顺理成章地流传开来。梁启超不是始作俑者,但作为曾与王国维有过交往、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的他,显然是这条谣传链条上最重要的以讹传讹者。梁氏的“枪毙

学者刺激说”一出,无论是否点中了王国维自杀的要害,至少列举的两湖学者被枪毙这一桩事例,是没有人会去怀疑的。谣传不脛而走,不疑者继续传谣;导致王国维死后八十余年,能有所怀疑者寥寥,对王葆心死因做深入查证者更是少之又少。

无巧不成书,实际上笔者也只是因偶得一册王国维所著《观堂集林》初版本,才又将其与“王葆心之死”这一多年前有所疑惑的史事联结了起来,并进一步激发了笔者作上述繁琐考证的浓厚兴趣。这是一册1923年密韵楼初刊本,也是《观堂集林》一书最早的印本;这是当年王国维亲自审定的唯一定本,只试印过极少数量,用于分赠友朋与自留存阅。展阅这册距今已九十余年的珍贵旧籍,笔者发现首页右下角钤有一枚篆文“晦堂”的印章;经过查证,这枚印章正是王葆心(号晦堂)所使用过的私印。这让人百思不解,难道这两位王先生历史上真有某种关联?

其实,这一册钤有王葆心印章的《观堂集林》,至少又给我们提示出两个重要思路,一是王葆心是较早研读王国维著作的同时代学者,二人可能确有一定交谊,否则这种不对外发售的著者私印本不太可能出现在王葆心的书斋中;即使是他人转赠,至少也说明两位王先生在思想层面是有过“神交”的。二是将王葆心与王国维相关联的梁启超,或许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指鹿为马;可能正是因二人确有比较密切的交往,梁氏才会做此联想。否则以梁氏一贯缜密谨严的学者风范,即使以讹传讹,也不会生拉硬扯出这么一位毫不相干的学者来吧?



王葆心旧藏,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初版本,版框右下侧所钤印“晦堂”即为王葆心用印

当然,历史事实是王葆心病逝于1944年,并非被枪毙于1927年,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两位王先生是否有过交往,以及这些交往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迹,则需要等到新的史料发现之后,再作进一步研究与考证了。

温州塾师对决梁启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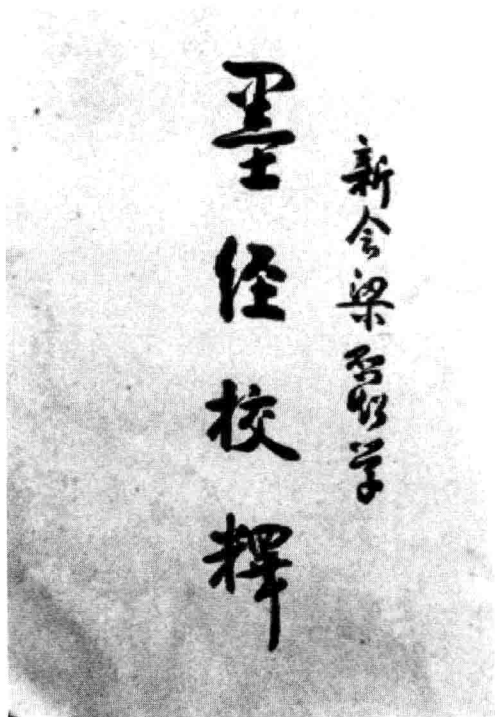
——兼及中国现代学术的变革机遇及其动因

小引：因梁启超、胡适拍案而起

民国十一年(1922)冬,在温州永嘉一所家塾中,屡屡传来一位青年男子的长吁短叹。书桌上搁着一本名叫《墨经校释》的新书,男子时常翻动几页,偶尔也翻到书末几页,这时往往情绪更加激动,拍案而起,或者掷书而去。

让男子长吁短叹的这本《墨经校释》,是当时名重一时的梁启超所著,民国十一年(1922)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排印,后多次重印。《墨经校释》首列梁启超“自序”,言《墨经》的科技成就以及校理之难,前人校注以及自己校释《墨经》的过程。书末则附有当时已经“暴得大名”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所撰“墨经校释后序”,也正是这篇后序,让男子情绪激动。

胡适序中开篇几行文字,就足



梁启超著《墨经校释》,1922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

以让男子忍无可忍，无法再读下去。序中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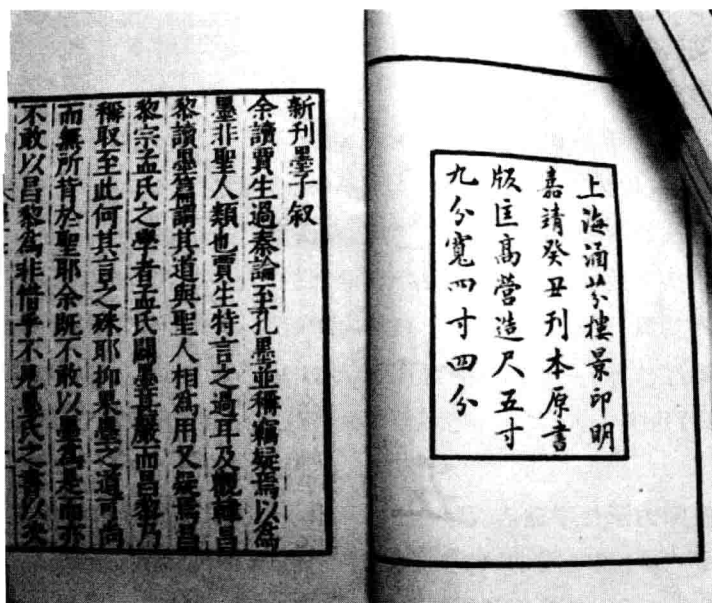
李笠(1894—1962)

梁先生的校释，有许多地方与张惠言、孙诒让诸人的校释大不相同。我们看这部书，便知道梁先生在这四篇书上着实用过许多工夫。我们虽未必都能赞同他的见解，但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例如《经说下》第六七条，“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则或非牛而牛也，可”，梁先生据明嘉靖癸丑本，于“则”字上校增“可”字。嘉靖本近始由上海涵芬楼列入《四部丛刊》印行，但从前校《墨子》的人都不曾见此本，故梁先生这一条乃是用嘉靖本校《墨子》的第一次。将来一定有人继起，把嘉靖本与他本的异同得失，一一校勘出来。

对梁启超著述、胡适序言发火的男子名叫李笠，时年才 28 岁。李笠曾名作孚，字雁晴，1894 年 11 月 17 日出生于温州瑞安城关，年幼时就读城关西北小学，1914 年毕业于瑞安县立中学。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遂勤奋自学，以温州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1848—1908)其人其著为毕生追崇，誓愿以读书、校书、教书为终生志业。孙氏的重要著述《墨子间诂》，他于中学毕业时就认真研读过。此时他任教的这所家塾，正是当年校定《墨子间诂》的永嘉名士王景羲开办的，后来被研读墨子学说者奉为必备经典的《定本墨子间诂》正是出自这位塾师之手。而恰恰他又正在给学生们专门教授《墨子》一书，至少八年苦读《墨子间诂》并将其奉为授课底本、研读必备经典的他，实在想象不到，竟然会有梁氏这样“大不相同”的校释著述问世；更无法接受，有胡适这样动辄称“第一次”的大唱高调、大肆追捧。

《墨子间诂》，朴学传统的最后寄托

众所周知，《墨子》是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现仅存十五卷，五十三篇，一般认为是由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学在不同时期记述编纂而成。据考，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号称“显学”，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与孔子差不多。墨子（约前 468—前 376），名翟，春秋时期鲁国人，相传做过宋国大夫，曾到过楚、卫、齐等国。早年受孔子的儒家教育，后弃儒学而开创与儒学相对独立的墨家学派，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学派性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推行墨子的主张。墨家的政治主张，都是以解救时弊为目的，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宣传天志、明鬼，针对当时流行的命定论，墨家又主张“非命”。在真理的原则上，主张经验论。伦理思想上，墨家的根本观念是“义”，“义”的观念来源于“天”，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义利统一的道德观。《墨子》确立了“三表法”作为立论说理的准则，在中国哲学史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体裁虽保留了对话的形式，但基本上已具论说文的雏形。



《墨子》明嘉靖癸丑本，涵芬楼影印本。被梁启超、胡适奉为墨学法宝的一个版本，但同样也是被大量误用误解的一个版本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先秦诸子书中，《墨子》是最难解读、最难理解的，因而后世学者对其进行校释也是最具难度的。今本《墨子》为汉代刘向所校定，已经过大规模改动。晋惠帝时，鲁胜曾作《墨辩注》，但早已失传，仅存其《叙》。《墨子》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冷僻，甚至无人问津。直至清乾、嘉年间，朴学大兴，对古代文字的训诂、古代经典的校勘之学风大盛，从而助推了《墨子》研究兴起，陆续涌现出许多注释或阐发墨学的著作。将这些清代《墨子》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备于一体的晚清学者孙诒让，自清光绪四年（1878）开始至光绪十九年（1893），历时16年完成的《墨子》解读经典之作《墨子间诂》，是后世学者读《墨子》的首选，也是不得不选的唯一经典。

《墨子间诂》一书把毕沅、卢文弨、孙星衍、洪颐煊、王念孙、王引之、苏时学、张惠言、杨葆彝、惠栋、顾广圻、钮树玉、翟灏、邵晋涵、庄述祖、江声、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俞樾、黄绍箕等21家的墨学研究成果，都有所取舍地列入其中，成为博采众家之长的里程碑式著述。书中更附有《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子传授考》等多种专题资料，所收各家专著的叙、序，更为难得，几乎把后世读者所能想到的《墨子》参考资料搜罗殆尽。当然，人无完人，书无完书，孙氏为自身不通自然科学的条件所局限，加之对有些珍罕的《墨子》版本也未能亲睹，致使对《墨子》的有些章句释义不确。

若论自然科学知识，孙氏自然无法与留洋归来、精通外语且阅历颇丰的梁启超、胡适二人相比较。若只就版本而言，孙氏倒也的确没有读过颇为梁启超与胡适所看重的明嘉靖本《墨子》。但斯人已逝，先贤光焰毕竟不应为后来才俊一笔抹杀。换个角度思考，若孙氏处于梁、胡二人的时代与境遇，《墨子间诂》一书定有更多新篇、新论、新见地，未必落后于时人；若梁、胡二人处于孙氏的时代与境遇，《墨经校释》一书或捧场之序也未必能写出多少“大不相同”的见地来。常言道，不可唐突古人，不可辱没先人，设身处地想想，道理相当浅显。

青年塾师力承朴学遗志

苦读了八年《墨子间诂》的李笠，作为孙诒让的同乡人，且仍在当地家塾专门讲授《墨子》的他，自然而然、责无旁贷地担当了以孙氏为代表的晚清朴学学术共同体的代言人。无论从地缘情感还是学派源流上来讲，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具备着某种传承性。这种传承性，与胡适对梁启超的亲近与亲切，是完全不同